

1. 四年前的秋天，我们在白叶村的渡口坐上春光叔的船。写下这句话，我都觉得浪漫过头了。但情况确实是这么个情况。那天是十月中，南方最好的天气，是下午四至五点，一天中最好的光线。春光叔开着的一艘木头的渔船，我和好友邓莉跟着他的船在江上行走了一程。今年，几天前，我们再去江上探访春光叔，他那艘渔船已经换成铁船了。

吾乡风物

渡口也换了一个。几年前那个渡口风清气爽，没有任何植物遮挡，正适宜“孤帆远影碧空尽”，适宜告别，当那叶扁舟开开很远，还能看到渡口上挥别的那双手——视野太开阔了。但现在这个渡口却完全不同，先要走下一条根本看不出有路的斜坡，在草从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到达江边，再拨开各种穿越各种植物藤蔓的纠缠，才能发现它。

所以它是一个真正的“野渡”，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的野渡，只停着春光叔自己那两艘船。他说上次我们去的那个渡口，被一些大船停着，小船不适合跟大船停在一起，所以他另辟了这个渡口。他的话，颇有一种高攀不起则自立门户的意思。

这两个渡口我都喜欢，我喜欢它们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，带给我不同的想象。我喜欢各种各样的渡口，套用沈从文著名的句子，“我去过许多地方的渡口，看过许多次的云”，这并不因为我行踪广泛，仅因我们大岭南水域多样，从海到江到小河湾。

小时候我有段时间和表妹跟外婆住在韩江边上，夜里便在火船靠岸的声音中入睡。先是一阵阵“突突突”，然后像叹息的一声长鸣，之后便是辽阔的沉静。但这沉静是由船员的隐约的说话声、江水在船身上的扑打声衬托出来的。船员们粗声大气地说着话，听不清说什么，只觉得很寂寞。

表妹前两年特意买了江边的楼盘。现在，无江江景成了一个卖点，但对她说可能更多的含义。她说希望能听到亲切的船声，尤其是火船靠近码头时“突突突”的声音，那种声音与睡眠联系在一起，是格外催眠的声音。但高层的时尚小区，隔音效果很好，浩荡江声不再闻。

那时候每当上游有船开来，总是在下午四五点的时候靠近码头。码头的周围自然地形成一个集市。船带来的

异乡人，货船带来的多是煤炭、木材，而从吾乡带回去的，则是蚊香、草席和毛巾。夏秋两季常有各种硕果，沙田柚，黄皮红柿，浮瓜沉李，还有一些如今想来尤其可贵的肉类，使码头边的交集更富于狂欢气息。

最吸引人的是那些走江湖的人，在这里展开他们的各式表演，有江西来的耍猴者，还有不知从哪里来的棋局高人，以一包烟的筹码在等待着对手。

当人们在码头上交易，船上的船员开始洗船。他们用一桶桶江水冲刷船身，尤其是客船，瓜子壳、果皮、塑料袋和纸屑混在洪流中消失，大船像个巨人一样抖掉了身上的水珠，变得洁净。这船本身和船上的人们，总是让我和表妹觉得好奇。

这是我和表妹在岸上观看的角度。而从韩江上游开船到来的春光叔和军民兄，则提供了从船上观看的视角。

2. 春光叔和军民兄分别住在靠江流经他们的村子。

他们年轻时就以行船为业。放排(竹子捆成的竹排)，开过渡船，坐过大客船。考虑到他们的年龄恰好比我们大多二十岁，所以当年，当他们的船来到潮州市区，码头上，七八岁的我和表妹正在兴致勃勃地看船。也许和他们的视线，曾在40年前有某一瞬间的交集。

这么一想非常奇妙。于是，他们的讲述补齐了我从童年起就对韩江行船的印象。

放排的风险自不必说，一般是两个人合力完成，一人站在船头，一人站在船尾，从他们的村子顺流开到潮州市是两个半小时，从潮州逆流开到特溪是四个

半小时。更有意思的是客船。那时候潮州一带的交通以水上为主，乘坐客船的人总是特别多，有些站如果没有下船的客人，客船就不停岸，不管岸上有没有人要搭船。

岸上等着搭船的，一般都是有要紧事要办的人，多数是天没亮就从山里挑着农产品来到江边，准备乘船进城去卖。有的有急事要办，比如到城里看病，搭不上船，急哭的都有。军民兄的父亲认识很多客船的船员，由此拥有一种骄人的特技：只要他在码头上招手，路过的客船就会靠岸。

很多有急事要进城的人都会提前请他父亲帮忙，明天要搭船，今天先预约。他父亲，一个人就是一个航运中介机构。军民兄说他那时候最喜欢的事情是跟着父亲乘船进城。他不需要像其他乘客那样争先恐后地挤进客舱，而是大摇大摆地走进宽敞的驾驶室，驾驶室里甚至有功夫茶喝，他和父亲坐在那里，隔着玻璃窗看着拥挤不堪的客舱，体会着特权的甜蜜。

也许因为客船与这种优越感联系在一起，客船上的人们都令他记忆深刻。直到现在他仍能记得从潮州至留隍的客船上，固定的小贩有三个。一个卖糖果，一个卖油豆腐，还有一个卖包子。卖糖果的是姐妹俩，都很漂亮，她们在留隍镇的码头上还有个固定摊子，所以轮流出船。人们讨论姐妹更漂亮还是妹妹更漂亮，很奇怪的，总会有所偏好，没有一个人说“完全同等程度的喜欢”。

卖油炸豆腐的是一个老头。吾乡人们爱吃油炸豆腐，有一句著名的广告语：皮酥肉厚。配上蒜泥醋蘸料，往往是三四个人为一小组，蹲着围在一起吃一份，吃得欲罢不能。他的生意如此之好，从来不

需要从出发站卖到终点站，大概一半的路程就可以卖上岸，然后等着回程的船。

卖包子的人，很憨厚老实，但生意较差。船从留隍七点出发，一般人都是吃过早饭的，包子又是典型的饱腹食物，不像糖果和油豆腐，有零食的娱乐性质。只有少数极为匆忙来不及吃早餐的人才会计包子。还有部分舍不得专程去吃午饭的人，也会买个包子随便吃吃。

由于水上交通的普遍性，韩江上有不少行业是国营性质，让人羡慕，包括客运公司、货运公司，还有航道维护的。航道管理站的常驻人员三四个，是镇上的人，他们收入稳定又没事干，每天手里提溜着手信找村里人喝茶聊天，慢慢的，关于管理站的人员的风流韵事，就变成了故事在村子里暗暗流传。

3. 前面我所写的，关于韩江上的行船和韩江边渡口上的故事，都非常静好，直到有一天，我认识了潮学研究李坚老师。

他研究的领域是清末民初的韩江流域的乡村。在他那里，我听到这条江上发生的很多血腥和残暴的事件。自古以来，商旅在河道渡口及码头边总会发生非常危险的事情，如地方恶棍的哄抢、地方权力的倾轧。更令人心酸的是，韩江流域兴盛的物资贸易催生了苦力帮，这些苦力帮之间的冲突和械斗一直都是码头故事的主题之一。

渡口(码头)的旁边，往往有市集，有各阶层人群交汇的活动中心。比如茶亭。比如庙宇或庵堂。

只要是人群交汇的活动中心，就会有纠纷。这些纠纷中，有的是挑夫、船商各个群体的利益争夺，有的是村子族群

之间，对渡口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争夺。这些争夺，又会与乡村宗族势力相关，往往酿成村庄械斗。

可以想象，码头其实就是漩涡的中心。

潮州城外的“蔡家围关口”是韩江木排贸易的主要放运点，大量的木排及商船云集于此，但这里有一段河道水势回环湍急，于是不少人专门守在河道事故多发点，守株待兔，等过往船只触石或者遇浪，一哄而上，抢夺货物。

潮州城外还有一个著名的竹木门码头，该码头设立于康熙年间，当时是韩江上游地区的大埔县商船户货运的专属码头。但它多次被码头周边的乡族势力所侵占。

李坚老师说，有一块道光十三年(1833)的石碑，描述了当地乡族试图通过恐吓、勒索其他船户的手段，与大埔商帮抢夺码头的雇船业。碑文说“县属船只到郡，必泊竹木门外大埔马头。或因水浅，方雇小艇盘载，乃日久弊生。艇户皆属土烂，无论水之浅深，悉为艇户所阻，别艇不敢向前，任意勒索饱欲，方载登岸……”

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韩江边上，事实上即便在今天，仍然存在内容不同的各种凶险。乡村从来不是静好的，我们知道这一点，但我们不需要知道得更具体一点。

4. 我还有另一个朋友，他说小时候，他家距离码头比较近，那是五十年前的事情，那时候，挑着货担从异乡来的人们会心无芥蒂地敲开他家的门，借宿或者存放货物。他们家因此结交了不少来自异乡的朋友。

如此场景，令人向往。作家王鼎钧说，小时候他们家也曾接待过南来北往的人们，这些来自各种行业的人，在古道热肠的王家吃过晚饭，作为回报，他们会分别教给尚在读小学的王鼎钧各种才

艺：认五线谱、拉胡琴、画素描、看相占卦、剪纸、打拳、简易魔术、刻图章。

就是各种异乡人，带着大江大河的故事，随水漂流，来到码头上停泊。然后又重新在这里出发。

这是码头让我激动的原因。

吾乡码头是在江边，但大海边的码头也是我激动的点。去过福建崇武的码头，去过海南莺歌海的码头，轮船像一个个巨人在码头上汇集，窃窃私语，巨大的身躯准备在大海上踩出脚步。

最近我看了一部电影《伊尼舍林的报丧女妖》，电影名字如此拗口，但其实讲了一个简单的故事。

在电影中，在那个封闭的伊尼舍林岛上，却也同样有着一个码头。男主角那个孤独的妹妹，决意要离开小岛，她就是这个码头上坐上船的。她向大海的远处摇摇晃晃地漂去，她那个同样孤独的哥哥站在高高的岸上向她挥手。这个镜头是整部电影中最富于希望的一个镜头。

关于渡口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来自《坛经》。当年惠能告别五祖南行，就在一个叫“九江驿”的渡口，那是靠近长江南岸的浔阳驿站。五祖弘忍说：“我是师父，该是我渡你。”惠能回答：“迷时师度，悟时自度，度名虽一，用处不同。能蒙师法令，今已得悟，就该自性自度了。”

意思是说，我已经可以自渡了。五祖说：那你去吧，努力向南，我不再相送了。

他们就在渡口边，完成了这段关于渡人和自渡的对话，让渡口成为一个更意味深长的所在。

小时候我们读过席慕容那首著名的诗，后来又被蔡琴唱成了歌：渡口旁找不到一朵相送的花，就把祝福别在襟上吧。

莫非那也就是如吾乡白叶村那样的一个空空荡荡的渡口，是即便最为荒芜的渡口，只要是渡口或者码头，即便它空无一物，它也不可能真的空无一物。



图为渔民春光叔和本文作者。更多图文请移步“文汇”App和“文汇笔会”微信公众号。

Section header '笔会' with a QR code and '文汇笔会' WeChat public account information.

张将军打虎

刘摩诃

读到明人陈如纶写的一篇《云岩先生张君墓志铭》，传主叫张嵩，是明代正德、嘉靖之际太仓卫的军官。他的曾祖父因为跟从明成祖“造反”有功，升为太原前卫副千户。仁宗洪熙元年，改太仓卫后所，就此定居太仓。传到张嵩，已经第四代了。四代人的军衔都是武略将军。

卫所，是明太祖朱元璋创立的军队编制制度。《明史·兵志》记载：“天下既定，度要害地，系一郡者设所，连郡者设卫。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，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，百十有二人者为百户所”，即一府之内驻军为所，连府之所为卫。一般一个卫“设左、右、中、前、后五所”，一个所又包括两个千户，十个百户。这些卫所，遍布京师到地方，“外统之都司，内统于五军都督府”。今天不少城市都是由明代的卫发展而来的，比如天津是天津卫，威海是威海卫，太仓是太仓卫。

卫所从军官到士兵都是军籍世袭，就是所谓军户。每户每代出一个子弟承袭军籍，如果有战争，“命将充总兵官，调卫所军领之”，战事结束，“官军各回卫所”。没有战争的和平时期，卫所官兵也并不闲着，他们要负责地方的捕盗缉私，要屯田纳粮，像太仓卫，还要把江南的钱粮运送到北京去。也就是说，兵、农、商要一身兼任。这样干杂活的“军队”，后来被寇寇打得落花流水，也在情理之中。(关于明代卫所军户的日常生活，他们如何被朝廷折腾，又如何滑天地的反折腾，哈佛大学明教授正好有一本有意思的著作《被统治的艺术》来专门探讨，值得一读。)

陈如纶在《墓志铭》里说，这位张千户“尤喜结交大夫士。大夫士亦喜与君交。家素无丰殖(就是家里并不富裕)，

日治具请客，四座常满，诗板酒筹，歌钟舞袖，杂沓交错，或竟昼夜。倪南江守太仓，方策尹昆山，以诗鸣过君，倡和流连信宿，动成卷帙。赠以《张将军歌》，极所推许”。看到这里，我还以为传主就像很多世袭军官一样，已经早早忘记武艺，转成文弱一书生了。没想到再往后读，却看到了他人生中一个武力桓桓的华彩故事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，明武宗正德末，张嵩受命负责太仓卫的漕运——

有江彬者，凭宠专恣，纵其党魏虎入京仓横索，声张势附，莫敢谁何。君适转输在京仓，虎亦来横索。君措地大叫曰：“我漕运万里辛苦，财力已竭，尔复横索，奈何哉！我直得一死，为天亡下君除害。”乃持虎掷于地，毒拳殴之。虎哀号乞命，其傍观者万众，莫不缩颈吐舌。监仓尚书遂缚君。明日，彬败矣。天下漕军，皆偷昔君若君。

明代的漕运，就是把江南钱粮经大运河运到北京去，这是一件天大的苦差事。明初昆山有个著名的文士龚舆，曾上书给南直隶巡抚周忱，痛陈时弊，其中一条即是漕运。据龚舆说，明朝刚建立时，沿袭的是元代的办法，走海运，从太仓刘家港发船，运去北京。后来觉得海上风涛太险，改为走运河。表面上看，运河漕运“去危就安，本以便宜，然军士反加愁苦，不若海运之欢忻”。为什么呢？

第一，海运危险，朝廷给的造船费、维修费和差旅费便很充足，使得军士既能养家，又能携带足够的旅途口粮；河运安全，就大大减少了这笔费用，实际内河船只一样需要日常维修，其成本却官转

民了。

第二，海船大，必须有压舱物，回程空船，正好用“已资贸易随路土产”，得以赚上一笔来养家。而运河船小，这种好处就没有了。

第三，海路看似危险，却是扬帆直往；运河河道窄，拥挤，经常有水浅的地方，行动极缓，一旦碰到逆风，根本走不动，只能停船等待。又因为从南往北，要穿越长江、淮河、黄河、海河，各处海拔不同，地势起伏，需要闸门调节，而排队过闸是非常痛苦的。相信去过三峡的朋友都能体会过闸的滋味。

最后，等到了北京仓库，大大小小的监收官员又各种刁难，就为了要钱。任何一个环节钱给得不够，那就不收，让人干等着，交了不差的。在食宿自理的前提下这样干耗着，谁受得了。如果遇到风雨天气，仓库方面还要收取额外的保管费、耗折赔偿费，这些都要漕运军士自掏腰包。

本来就是小船，能够给自己准备的钱粮就不多，返程能携带的土产也少，朝廷发的费用又大打折扣，最后“所得行粮，计其口实，费用十不及一”。所以很多军士一旦遇到漕运的任务，只能去借钱，最后“赔偿计息，经年累月，力不得纾”。困难的家庭，“甚有夫朝出门，妻子暮即求乞者”。最严重的情况，“又有计无所出，甘于自经以就死者”。古代专制制度下的“便民”措施，往往如此。朝廷拍拍脑袋，下面出工出力的人干活加倍就算好的了，破产丢命，那也不稀罕。

龚舆提到的，还是明代前期正常情况下下的漕运。而张嵩就更倒霉了，因为他碰上了江彬。《墓志铭》里提到的江彬是正德朝第一佞幸之臣。他本来是宣府的军官，因缘际会，被正德皇

帝所赏识。正德是著名的中二皇帝，浑身的腱子肉，整天憋着劲要找地方发泄。正好遇到了善于投其所好的江彬，于是两人整天腻歪在一起，又是健身又是骑射。这一对狂热的军事爱好者光在北京假操练当然不能满足，于是江彬不断怂恿小皇帝去宣府、大同前线各地去过打仗的瘾。戏剧、电影里著名的“游龙戏凤”的故事就是以此为背景的。随着正德的军事游戏不断升级，江彬的权势也越来越大，到正德十四年，“命彬提督赞画机密军务，并督东厂锦衣官校办事。是时，张锐治东厂，钱宁治锦衣，彬兼两人之任，权势莫与比”。(《明史》卷三〇七《佞幸传·江彬》)。不但参与军事决策，而且控制了东厂和锦衣卫，可以监控文武百官，当然“权势莫与比”。

然后我们倒霉的传主张嵩就在正德十五年督运漕粮来到京师。江南是天下财富的中心，江南军士运粮至京，等于自动上门的大肥肉，不狠狠咬上几口，那就枉做坏人。江彬这种典型的坏蛋做官自然来全套的，派人来京索要钱，理所当然。于是，张将军拳打魏虎的精彩一幕，就此上演。

我们看《墓志铭》的记载，张嵩是先把魏虎摺在地上，再扑上去一顿胖揍的。如果结合《明史》记载，我们会发现，张将军力气一定很大，武艺一定很高强。因为江彬得宠后不久，“欲藉边兵自固，固盛称边军骁悍胜京军，请互调操练”，得到皇帝首肯，“于是调辽东、宣府、大同、延绥四镇军入京，号外四家，纵横都市”。这个魏虎既然是江彬党羽，那大概率是“外四家”的军官。堂堂一个北方前线作战部队的军官，居然轻轻松松就被摺倒胖揍。看来，张将军不但文能吟诗做对，武也有鲁提辖的身手。在江南四代之后居然还能保持如此这般的战斗力，不能不让人赞叹了。

张嵩足够倒霉，也足够幸运，他刚刚被抓起来，就赶上正德帝驾崩。然后首辅杨廷和(大才子杨慎的父亲)旋即逮捕并处死了江彬。抄江彬家的时候，据说“得黄金七十柜，白金二千二百柜，他珍琦不可数计”。这就是官场保留剧目，不稀奇了。

闭目塞听

余斌

用耳机听音乐的好处，我是后来才领略到的。最初见到的耳机是半导体收音机上的，一根线，一个耳塞，只塞在一边的耳朵里。小时候觉得很神奇，仿佛它将小匣子里的声音一网打尽，而后聚齐了灌进你的耳朵里，旁人再不能分享，我老是联想到打散装酒时那只插入瓶中的漏嘴，虽然二者一点不相关。

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耳机、短波拉杆天线的有无成为我判断半导体收音机是否“高级”的重要指标，相应地，除了热衷于毫无必要的将天线伸伸缩缩之外(比如听的是中波的节目)，我也喜欢戴着耳机听音乐，——不是怕干扰他人，也不是自己有被干扰之虞，就是觉得这样收听，比较特别。直到有一天，发现耳机其实很“草根”，最简单的所谓单管机，没有喇叭，还非用它不可。不过这并未减弱它“奇技淫巧”的性质，只是我没把它与听音乐联系起来。

等到我发现听音乐对很多人来说乃是耳机的主要功能，耳机已经不再形单影只，都是成双作对地出现了。起初是看到留学生在宿舍里常戴着耳机摇头晃脑，一副陶醉的样子。过不久随身听出现，街上就多了一景：随处可见两耳朵下面垂着线的人。

我自己喜欢上音乐之后也用过耳机，转录磁带时用来监听。是很大的整个将耳朵罩住的那种。像现在录音棚里歌手戴着的家伙。但不喜，头上戴着个异物，像冬天戴耳罩似的，难受，尤其是夏天。此外硬性地将声音堵在耳朵里，似乎也太过戏剧化，不像乐音从音响里出来触到耳膜那样来得自然。所以喜欢听乐之后至少有二十年，与耳机无缘。没想到几年前却开始屡屡向人说起耳机的好处。这是由于网上听乐而起的，我发现网上搜乐来得个方便，奈何电脑上带的喇叭送出的声音实在单薄得让人意下未足，且上网常是半夜三更，放大有扰民之嫌。不得已，只好戴上耳机。始料未及的是，一经戴上，就摘不下来了，人声、琴声忽然就变得饱满、亮丽，戴与不戴，判若两事。

影，水族们摇曳的斑斓。说是“闭目塞听”，这当中“闭目”当然可以是听迷们出神状态的一种写照，好多人听到浑然忘我之境都会习惯性地闭上眼睛。“塞听”就不用解释了，只不过这里的塞是为了选择另一种“听”。其实即使睁着眼，音乐的作用之下，也会多少进入视而不见的状态，或者，眼见之物仿佛也有几分异样。

这么说多少是基于个人经验。某次一大早在去学校上课的班车上，这时候通常我都是闭目养神的，那日带着电脑，就戴了耳机听下载的音乐。车在行驶，乐声响起，渐渐就有些恍惚，周围的声音并非一点听不到，却好像隔着老远，连带着身边坐着的人仿佛也隔着一箭之地，唯唯上汽车行驶时的轻微的震动，有一种不真实感。待阳光射在脸上睁眼看时，透过车窗玻璃，只见远处一轮红日挂在林梢，漫天的红光。车几经转折，太阳一时在这边，一时跑到那边。这时耳机里正响着《太阳照常升起》的主题音乐，久石让“狩猎进行曲”铿锵雄壮地进行着，到高潮鼓钹齐鸣作金石声。不记得影片中对应的画面，曲子与眼中所见不期然地“同步”，倒似它就是为远处的太阳而设，关键是，身边的那个世界仿佛不存在了，于是乎音乐作用之下，竟像是在目睹一场辉煌壮丽的日出。

不会一会儿车到目的地，掉个头太阳就不见了。车停下后连忙取下耳机合上电脑。同车的车人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，等着下车，车窗外是捧着早点赶往教室的一群一群的学生。未曾想下了车竟又与太阳照面。几分钟工夫，红色已然褪去，换作亮白，分了“伴奏”，在一片校园日常声响的背景上，太阳很平常，与方才所见，简直不是同一个。